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歌德集 02 高中甫 编选

漫游者的夜歌

歌德诗选

〔德国〕歌德 著 冯至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歌德集 高中甫 编选

漫游者的夜歌

歌德诗选

〔德国〕歌德 著 冯至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游者的夜歌 / (德) 歌德著; 冯至等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11

ISBN 978-7-5426-5348-2

I. ①漫… II. ①歌… ②冯… III. ①诗集—德国—
近代 IV. ① I51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405 号

漫游者的夜歌：歌德诗选

著 者 / [德国] 歌德

译 者 / 冯 至 绿 原 高中甫 樊修章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梁清波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TEL: 010-59972572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69 千字

印 张 / 21.75

ISBN 978-7-5426-5348-2/I · 1075

定 价：32.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译本序 识其人而知其诗，读其诗而识其人

高中甫

沃尔夫冈·歌德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之一；他生于十八世纪中叶，逝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度过了八十三个春秋。在这近一个世纪中间，在德国和欧洲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社会进程的事件。1824年2月25日他对艾克曼不无感慨地说道：“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①在这之后直到他逝世的1832年的八年里，还发生了改变欧洲现状的法国七月革命等事件。他不仅仅是一个证人，而更是用笔写下了他的证言。伴随他漫长一生的是他永远活跃的创作激情。他在一首短诗里写道：

生活在世界历史中的人，
难道他应当把自己顾怜，哪怕是瞬间？
谁锲而不舍用目光紧盯住时代，
他才可以议论，才配写出诗篇。

或者如他在1797年一份描述自己的文稿中所言：“永远活跃的、

^① 见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停顿自内向外发生作用的诗歌创作冲动，是他存在的中心和基础。”在他的笔端，呈现出的是时代风云，映射出的是历史的运动，描绘出的是万物的面貌，追求的是生活的真谛，反映出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海涅说得好，世界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于是就创造了歌德，歌德是世界的一面镜子，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他本人亦在其内的一面镜子。

歌德八岁时，用稚嫩的小手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歌，这是他在1757年时写给外祖父母的新年贺诗，到1831年10月他完成了他的自传《诗与真》的第四部，并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写下了一首四行诗《年轻人……》。

在这七十多个春秋里，他创作了小说、戏剧、叙事诗、抒情诗、文论、科学著作，包括日记、书信在内，以权威的魏玛索菲版计，共一百二十九卷。

理解歌德包括他的诗歌在内的创作，他本人在他的自传《诗与真》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他写道：“这样在我的一生中，我们不能偏离的一种方向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说，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能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为自己做以了结，便于去校正我对处理事物的理解和使我内心得到安宁。没有人比我更需要这种把他的本性从一个极端抛向另一极端的才能。”他接着写道：“我所写出的一切，只是一部巨幅自白的片段。”狄尔泰在他的《经历与创作》这篇著名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表述：“歌德创作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特点就是，它出自经历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他更进一步地解释说：“到1796年完成《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为止，歌德的全部创作都是出之他的个人的经历。”在歌德的作品中，无论小说、戏剧、诗歌，都是他本人经历的一种艺术性再现，都是他本人生活的一种折射，是欢乐的一种释放，是痛苦的一种和缓；他借助他的创作使受到磨难的灵魂得到解脱，可以说，歌德的创作是一种自我蜕变、自我解放，也是自我发展的过程。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克拉维果》《塔索》《伊菲格涅在

陶里斯》《威廉·迈斯特》《浮士德》等中，读者都能清晰地看到歌德的存在；在他的抒情诗中就更为明显可见。这里不妨引用歌德说的一句更直截了当的话，1827年9月27日他对作家和翻译家卡尔·伊肯说：“我写出的一切都基于生活经验，这样我就可以表明和希望，人们能够和会再次经历我的创作。”歌德的创作以诗歌始，也以诗歌终。包括《西东合集》在内，他一生写有两千多首诗歌，在体裁上从早期的阿那克里翁体^①到晚年的信笔拈来的诗句，几乎涵盖当时所有的诗体：民歌体、颂歌、自由体、六音部诗、Distichen（两行诗体）、十四行诗、哀歌体、格言体、谣曲等；就其内容而言，有抒情诗、叙事诗，富有哲学的思想诗、讽刺诗、格言诗等。它们，除去为数不多的宫廷应制诗和应酬、游戏之作，共同组成了歌德诗歌大花园中的各种绚丽多彩的奇花异葩。

在这座诗歌花园中间，那些抒情诗尤为鲜艳亮丽。它们都是歌德生活和情感所投下的影像。斯·茨威格在为一部《歌德诗选》写的序言中说得好：“在歌德那里很少有没有经历而写出的诗歌，这也正如很少没有诗歌的金色影子的某种经历。”把它们按写作年序排列起来，歌德的情感生活、艺术创作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便清晰可见，他的人生轨迹便凸显出来。这也即是说，不了解歌德本人的生活，便无法理解他的诗歌的真正内涵和真正的意义。

歌德的第一批诗歌产生在他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期间（1765—1768），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安内特》被谱成歌曲出版了，随后又在从莱比锡返回故乡法兰克福后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题为《新歌集》的诗集。《安内特》中收进了19首诗，这其中有这本《漫游者的夜歌》中的《致睡眠》；1769年歌德的第二本诗集出版，但没有署他的名字，这其中有《良宵》《幸福和梦》等。这都是些短小的、有着当时流行的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歌德真正投入情感的是那些抒发爱情的诗。他在莱比锡求学期间爱上了一家酒馆的女儿安娜·卡特

①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82—前485），希腊的伟大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多是以歌咏爱情、女人、美酒为主题，诗句华丽。

琳娜·许克普夫，即是歌德在《诗与真》中的安内特。歌德爱上她，也就是在这种炽热的爱中，他写下了这些使他感到爱的欢乐和因爱而带来的苦恼。歌德和安内特这段恋情由于年轻恋人所带有的脾气作怪，和随之歌德因咯血离开莱比锡而结束了。值得注意的，就是歌德在《诗与真》中讲述这段爱情经历时，写下了上面所引用的那段话：“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

给歌德带来诗歌创作上的突破的是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学习年代，从1770年4月至1771年8月的不足两年的期间，他读完了学业，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但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当时“跻身于那些早已为国人所仰望的第一流人士之列”（《诗与真》）的赫尔德，歌德对他怀有强烈的爱慕和敬重，而尤为重要是在斯特拉斯堡近郊的萨森海姆经历了一场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作为狂飙运动纲领制定者，赫尔德对歌德思想上和诗歌创作上起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与赫尔德的交往中，歌德接触了莎士比亚，熟悉了苏格兰诗人欧西安的诗歌，接受和喜爱上了民歌；而且创作了民歌体的诗歌《野玫瑰》《紫罗兰》《屠勒王》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标志着他诗歌创作上的一个突破，突破了莱比锡时期阿那克里翁风格的束缚。歌德在斯特拉斯堡不足两年的时间，所创作的诗歌被称为“萨森海姆诗歌”，这中间不仅是他的少数民歌风的诗歌，而主要的是他的爱情诗。歌德在萨森海姆邂逅了一个牧师的女儿弗里德利克·布里昂。正是这个美丽而朴素、俊俏而端庄的少女扣动了歌德的心扉。歌德热烈地爱上了她，她也以自己的爱回报。在《诗与真》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中，他以欢快的笔触描绘了他与弗里德利克相爱时的种种愉悦的场景；他更用他的诗情把这些欢乐化为诗。他在这个时期写的抒发爱情的诗歌中有《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以及《描花丝带附诗》《弗里德利克，醒醒》等。《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匆匆和恋人相会时的狂喜和旋即离去的惆怅；在后一首中诗人抒发了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对大自然感受到

的快乐、激动。大自然不再是陪衬，而是作为独立的形象，与主人公的情感或相峙而立或融为一体。它们的情感纯真、强烈；音节铿锵，韵律优美，节奏鲜明；成为歌德诗歌也是世界诗歌中的珍品。

歌德在1771年8月结束学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稍后他不辞而别返回法兰克福，随之歌德的这次“始恋终弃的爱情”宣告结束；弗里德利克为此终生未嫁，而歌德也一直为此歉疚悔恨。他在他的作品《诗与真》《葛兹·冯·伯里欣根》《克拉维果》，也包括《浮士德》（第一部）中，做了他文学上的忏悔。

歌德返回故乡后不久就前往魏茨拉帝国法院实习，认识了也爱上了夏洛特·布甫。这是一次无望的爱情上的经历，它成了歌德稍后返回法兰克福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动因，这部作品以及他此前不久完成的戏剧《葛兹》和未完成的《普罗米修斯》（留下的片段即收在此选集中的那首《普罗米修斯的独白》），都是发生在1770年至1785年文学上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性的作品。此外尚有《穆罕默德之歌》《伽尼墨得斯》《艺术家的晚歌》等，这都是崇尚天才、歌颂自然之作。

1775年，是歌德生活史重要的、有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的4月他与一个银行家的女儿莉莉·勋内曼订婚；在同年年底他在魏玛认识了夏洛蒂·冯·施泰因夫人。歌德的一些优美、深沉的爱情诗就是为这两个女人而写的。歌德与莉莉的婚约不足半年就解除了，然而这半年时间却是集欢乐与烦恼、幸福与苦闷于一身。他爱莉莉，却不愿意失去自我，他欲罢却又不能。他不愿意与莉莉周围的“俗不可耐”的人周旋，可是即使他离开莉莉的身边却仍感到找不到自己的幸福。他喊出“爱情，爱情你不要把他纠缠”，可他却仍陷不断“这条纤小的魔线”；而当他意识到自己是“莉莉动物园”中的一头笨熊时，他毅然地摆脱了这段恋情。他这期间写的一些诗歌《新的爱情和新的生活》《致伯林顿》《莉莉的动物园》等，用这些诗不仅倾泻了自己的情感，也为自己的生活重新校正了方向。尽管他此后在一些诗中和戏剧《斯台拉》的初版献词中仍旧怀念他与莉莉相爱

的日子。

歌德离开了故乡，1775年11月应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之邀到了魏玛，成为公爵的知心好友，得到了公国执政者、奥古斯特母亲安娜·阿玛莉雅的器重，并于翌年6月被任命为公国的枢密顾问，他登上了仕途，在政治舞台上有了试身手的机会。这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他的思想更为拓展，他的观察力更为敏锐。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如奥托·孔拉迪在两卷集的《歌德传》所谈的：“继续存在的对个人权利的要求，他与自然相连的经历，他对实现自我的希望。”^①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希望》《浪游人夜歌》《海上行》《水上精灵之歌》《冬日游哈尔茨山》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冬日游哈尔茨山》，歌德1777年冬随同奥古斯特公爵在哈尔茨山狩猎途中离开，独自骑马漫游哈尔茨山，之后用希腊颂歌体写成这首诗。这是一首不易理解的诗。它的跳跃性强，跌宕起伏，转折迭现，内容不相连属；读后有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受。歌德本人借评论他人解释这首诗的机会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分段做了梳理和解释。诗人和歌德学者冯至在谈到他读这首诗的体会时称，它表现了歌德本人的思想在过去与现在、不幸与幸福、空想与事业、现实与理解之间的徘徊。这首诗的艺术性得到了高度的评价，里尔克在1912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称：“这首诗是纯正的出色之作……这首《冬日游哈尔茨山》此后我就视为是最有力的最纯洁的，它是最美的诗作之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伤它分毫。”^②

在魏玛的初期十年间，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交往是他生活史绝对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章。夏洛蒂·冯·施泰因是魏玛公国宫廷的马厩总管施泰因的妻子；她比歌德大七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容貌说不上漂亮，但却有着少妇的魅力，温柔聪颖，贤淑内蕴，是一种智慧型的女人。歌德一进魏玛不久，就被她所吸引。他俩几乎每天见面，一道读荷马、斯宾诺莎；她为他记录他口授的文学和科学著

^① 见奥托·孔拉迪《歌德传》，第一卷，第294页Athenäum。

^② 转引自《歌德诗歌》，475页，E. 特伦茨编选，伯克出版社，1978年。

作，誊清文稿，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和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朋友。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薄弱之处由于你而得到保护，我的漏洞，由于你而得到填充。”歌德从1776年始共写给她一千七百多封信和短柬，他在一封信中称：“我的灵魂紧紧依附在你的身上，你的爱是我生活中的灿烂之光，你的赞扬是我无上的荣幸。”（1781年10月29日）称“她是自己灵魂的引路人”。他俩之间的关系超出友谊，但绝没有越过底线，可以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写有两卷本《歌德传》的著名学者毕肖夫斯基称歌德与施泰因是一种“灵魂上的婚姻”。歌德在他朋友给她本人的信中，尤其是在他的诗作中，倾注他对她的依恋，抒发了他对她的爱情；诗歌成了他的情感的唯一外化形式。他在1784年8月致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之所以那样喜爱诗歌，是因为我在此中能以成千种形式谈论你，谈论我对你的爱情，除了你任何人都不会理解的。”他为施泰因夫人写的这些诗歌，如《命运，为何给我们慧眼》《不得安宁的爱》《致丽达》等都已成为歌德抒情诗中吟咏爱情的名篇了。

歌德与施泰因夫人的友谊持续十二年之久。1786年9月他前往意大利，不辞而行，不仅没有告知卡尔·奥古斯特公爵，连施泰因夫人也不得而知。职务遇到的阻力，环境的污浊，他的精神、他的创作激情被窒息，他疲惫了。就是与施泰因夫人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一种灵与肉的冲突。于是这位魏玛公国的重臣，匿名逃往意大利，逃往他童年就向往的意大利。

歌德在意大利停留了仅一年半多，1788年4月由罗马返归魏玛。而就在返回魏玛的一个月之后，他就在公园里邂逅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乌尔庇尤斯。他对这个充满青春活力、朴实大方，虽不十分俏丽，但别有风韵的姑娘一见钟情。他很快就与比他小16岁，时年二十三岁的克里斯蒂安同居了。歌德顶住了各种非难和物议，他在灵与肉上得到愉悦和满足。他没有像此前那样，用诗歌来抒发他对自己所爱的女人，如安内特、弗里德利克、莉莉的爱恋；在寥寥无几的诗歌中只有他在1813年写的那首《找到了》是他当时情感的写照；

但克里斯蒂安在歌德这时期的诗作中依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返回魏玛后，歌德在 1788 年至 1790 年完成了由二十四首组成的《罗马哀歌》。可以说，如果没有克里斯蒂安的情与爱，那这组长诗会大为逊色。赫尔德在 1795 年 7 月 25 日致友人信中写道：“大多首哀歌是他返回后在迷恋乌尔庇尤斯女士的初期写就的。”

《罗马哀歌》(Römische Elegie) 原题为《罗马情歌》(Römische Erotik)。Erotik 这个字本义就是性爱、肉欲，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Erotik 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发表时改为《罗马哀歌》，哀歌 (Elegie) 是一种六音部和五音部古罗马的诗体形式，表达的是对往昔的感伤、哀怨、眷恋的情绪，也可以用来抒发怀念和回忆的情感。这首《罗马哀歌》是他对意大利停留期间的某种形式的总结。艺术、大自然、古罗马的爱情诗人和神话中的那些追逐性爱的神祇都成为他描绘的对象；而更重要的一个主题则是性爱的欢愉和自由。已为歌德研究者所公认的，近四十岁的歌德在罗马才第一次体验和享受到性爱的快乐，他在罗马才第一次有一个情人，即第十八首中提到的福斯蒂娜。与克里斯蒂安的结合，更加重了《罗马哀歌》中的性爱的分量。在由二十四首组成的《罗马哀歌》中，歌德在少数几首中描绘得十分大胆恣肆，用字毫无禁忌。这使歌德在发表时把其中两首撤了下来。在这个选择集里，由于篇幅所限，我选了包括这两首在内共十四首。

歌德从意大利返回，他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位置和自身的价值。1787 年 3 月他在给公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我是什么呢？是个艺术家！”他辞去许多重要公职，只负责文化和艺术的事务。他致力于科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上的创作。由于与克里斯蒂安的同居，引起了施泰因夫人的不满，持续了十二年的超乎友谊的关系中断了，但是他有了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是他与席勒的结交，随之形成的真挚的友谊。从 1794 年至席勒逝世的 1805 年，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开创了德国文学史的一个“古典文学”时代。从罗马归来，特别是在与席勒合作的年代，他精力充沛，诗才勃发，

除完成了组诗《罗马哀歌》外，创作了《培索》《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抒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浮士德》第一部。在诗歌创作上，要提到的是他与席勒 1795 年共同发起的一场讽刺短诗之战和 1797 年的“谣曲年”。

所谓的讽刺短诗就是指一种两行体的赠诗（Xenie），一种类似格言的诗体形式。1795 年歌德目睹德国文学界、学术界的种种不良弊端，他和席勒办的一种文学刊物《季节女神》遭致非议攻击。他感到愤怒，于是联合席勒，用这种短诗形式进行反击。这一年他俩共写四百一十首两行体的短诗，对德国文坛、德国文学学术界的丑恶现象进行攻击，苛刻地嘲弄了他们的敌对者；同时也借此机会申明了他们的美学观点，表达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科学的态度。

这些讽刺短诗的发表激起了德国文学界的一场轩然大波，歌德和席勒，而主要是歌德受到激烈的反击。然而他和席勒并没有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而是掉转头来进行创作，他在 1796 年 11 月 15 日致席勒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勤奋地创作更伟大的更高尚的作品，和把我们的诗意的本性转化为高贵与善良人的形象，以羞辱我们所有的对手。”1797 年他与席勒各自写出了多首叙事谣曲，这一年就被称为“谣曲年”。

谣曲（Ballade）是欧洲文学中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与民歌有着亲缘关系的体裁。谣曲是以诗的形式讲述一个完整的事件或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有抒情性的描写，有戏剧性的冲突，是“叙事的诗歌”。歌德还在早期就以这种体裁写过《屠勒王》《渔夫》《魔王》等，在这个谣曲年歌德创作了《掘宝者》《科林斯的新娘》《神和舞女》《魔法师的徒弟》等。这些谣曲创作表明了他艺术上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对生活、人生观察和哲理思考上所达到的高度。读者在阅读时得到的不仅是审美上的享受，而且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1805 年 5 月席勒的病逝对歌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挚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失去了我生命的一半。”

他为了缅怀死者，想完成死者的那部未竟之作《特米特里》，但未果；为悼念席勒，在一场演出席勒的《大钟之歌》，他写了一首收场诗：

他是我们的！让这骄傲的字眼
发出的声音远盖过那揪心的悲痛。

.....

他的精神威武地继续
向真、善、美的永恒迈进。
无形的平庸，留在他的身后，
把我们大家束缚得紧紧。

席勒的逝世给歌德带来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孤独。从1806年起，他的情感恢复了平衡，开始频繁进行交往，勃发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诗情。1807年间他写出形式固定、韵律严谨的十七首十四行诗。创作这些十四行诗的缘起，是1806年12月与浪漫派诗人查哈利亚斯·维尔纳等人一次耶拿的集会，维尔纳朗诵了他的一些十四行诗，这激起了歌德的兴致。在谈及此时，他写道：“这是席勒死后我第一次在耶拿平静地享受到聚会的快乐；在场人的友谊激起了对逝去的人（指席勒——编者注）的思念和对再次感觉到的损失所要求弥补的渴求。……在这样的时期，诗歌艺术却提高和宽容地显现出来，对心灵的要求予以提高，对强烈的满足感予以宽容。这就是施莱格尔从前娴熟运用的，由维尔纳乐于提升为悲剧性的十四行诗体。”^①

但事实上，歌德在这十七首十四行诗中所流露所表现的，超出了他在上面这段引文所表达的。当时经常在耶拿出版家弗洛曼家里，和在耶拿近郊齐格萨男爵庄园举行的聚会上，出现了两位年轻美貌的少女弗洛曼的养女米娜·海尔茨伯利（1789—1865）和齐格萨的女儿苏尔维（1785—1855），他俩都对这位已近花甲之年的诗人抱有

① 转引自奥托·孔拉迪《歌德传》，第二卷，第338页。